

目 录

忆杨伯恺先生一段往事……………杨春蕊（1—4）

营山茶馆……………高中乾 龙 辉提供资料

陈永康撰写（4—12）

营山工商界在“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中……………龙辉（12—13）

周光烈惨遭土匪杀害……………刘执中王济民（14—15）

惯匪陈彬如……………陈朝典搜集部份资料王定华撰写（16—19）

解放后的营山天主教……………何 隐（19—22）

营山教案……………根据县志办提供资料和张国志、

龙辉、何隐等历史老人座谈文史组整理（22—24）

坐歌堂……………龙明德（24—29）

堂馆刘显荣……………唐惠来（30—32）

久负盛名的打石湾……………张映斗（32—34）

忆杨伯恺先生一段往事

一九四六年春，我因公去成都，得刘天文同志引进，去拜会了杨伯恺先生。伯恺先生住在成都双栅子街一座平房里。我早就听说杨先生是有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去拜访这样的人物我还是第一次，不免心情有点紧张。杨先生的家庭和普通居民一样，既无多的陈设，也无华丽的家具。饭厅里只放了一张饭桌和几张椅凳，兼作会客室。首先见到的是杨夫人和他约十岁左右的女儿，她们与普通住户人家妇女并无两样。

一会儿伯恺先生从书房出来。大约四十多岁，身材瘦长，穿一件兰布皮衫，面容严肃，两眼炯炯有神。天文同志把我向杨先生作了介绍，他听说我刚从故乡来成都，又是小学教员，杨先生面孔松弛了许多，他非常和蔼地请我们坐下。杨夫人给我们沏了茶。

时值抗战胜利不久，正复员时期，杨先生询问了他最关心的从外地回乡青年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我向他汇报了回乡的大学生多数都在县中教书，目前正在准备复员，有些中学生毕业未升学的在教小学。这些青年学生为了促进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大家捐资在县城开办了一座书店。杨先生听到开了书店，很感兴趣地说：“这样很好嘛！以前我也办过书店，都是一些青年人搞起来的。在地方上开书店，为地方上作贡献是应该的。”杨先生问到青年的学习。我说：“青年

人都喜欢读书，但没有固定的学习形式。”杨先生强调：

“要把青年组织起来学习。读了书可以开讨论会，可以开时事座谈会，若没有资料我可以供应。等我清理一下，能装上一挑，你回去时可以带走。”后来我们果真运了一挑书回营山，供学习之用。

继而又谈到办报的问题。杨先生当时正在筹备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众时报》的出版工作。杨先生是该报的经理还兼代主笔（后来主笔为马哲民），工作非常繁忙，他谈到报纸时说：“要办一张好的报纸，第一是办报队伍的纯洁性。我们的《民众时报》是不要国民党和青年党的，有了他们会把报纸办糟，我们有一批信得过的编辑和记者。我们还培养了一批半工半读的学生，他们白天印报、送报、卖报，晚上学习。他们的待遇不高，但是为了事业他们肯干；第二是靠大家来办报，靠社会上广泛的支持。《民众时报》就有不少的人给以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还有许多人给我们写稿不计报酬。另外我们准备在社会上大量发展通讯员，能反映各地的情况，你可以在营山给我们介绍两位通讯员，要信得过的。”我当着杨先生的面，报名愿当通讯员，还介绍了雪莱书店的陈祥嗣。后来《民众时报》还给我们发了通讯员证书。

杨先生为了让青年人长见识、增才干，去看看工人群众是如何工作的。临别时杨先生对我说：“明天上午你可以到我们报社来看看，我在那等你。”

《民众时报》社座落在东大街并排北面一条小街上。等我到达时，杨先生已在那里了。他带领我看了印刷车间。工人们正在安装机器，有的抬、有的擦、有的装，他们满身满

脸油污。那时虽然春寒，工人们却干得热气腾腾，头上汗珠淋淋，也没有人休息。然后我又参观了排字房，这里面差不多都是学徒工，有的正在整理铅字钉，有的正在上架，有的在检字，准备印刷，处处都显出了一派活力。杨先生没有让我参观编辑室，那里工作紧张，需要安静。

一天，刘天文同志告诉我：“今天夜晚我六叔（刘塋南先生）家要开个会，你也可以去听听。晚上我们一同来到刘塋南家，一看有杨伯恺、张雪岩，还有一些中、青年人我不认识，我想这可能是民盟的什么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发动群众索还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间，借了四川粮民的债谷。当时称为“索谷运动”。在发言中我才知道，国民党借的这批债谷，抗战胜利后已还给了四川，却又为四川国民党当局所把持，大部份已中饱私囊。四川群众对国民党极为不满，民主同盟公开出面，发动群众向国民党索还债谷。这晚在会议上首先发言的是刘塋南先生。他慷慨激昂，痛斥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行为，声称对粮谷一事，必须与国民党斗争到底。我过去不认识塋南先生，听了他的发言，心中自思，为何这般激烈？直到伯恺先生发言时，见他脸上的严肃表情比第一次见面还要深沉，灯光下两眼灼灼发光，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他直称国民党是反动派。称四川当局是黑暗势力、是蛀虫。他说：“不把这些人的推翻，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杨先生这一夜的讲话给我的印象极深。我虽然记不得他讲话的全文，但对他的声音、表情我多少年来都未能忘记。在旧社会的革命斗争中，他好象一个浑身披挂的骑士，在第一线奋勇冲锋，并随时准备以自己的生命，去殉追求的事业。后来也为事实证明，的确为此。

隔了两天我问天文同志：“杨先生这样有名的人，为什么对我这样一个小学教员还能如此看重？”天文同志说：“他不只是看重你这个小学教员，他对许多青年都是爱护的，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关心他们的成长，他一贯如此，所以，他受到许多青年的尊重和热爱；另外，他疾恶如仇，对反动派他毫不客气，直来直去，揭露其丑恶行为，国民党非常惧怕和痛恨杨先生，总想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杨先生这个人好学不倦，生活简朴，为人谨严，爱憎分明，真所谓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确实是我们青年人的楷模”。

这次与杨先生见面共三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直到他被反动派杀害。时间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但杨先生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时刻勉我自励，催我奋进。

杨春薇

营山县城的茶馆

解放前的营山县城，人不过六七千，街只有十几条，但茶馆可不少。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茶业同业公会统计，竟多达五十四家。其中最多的是袍哥公口茶社，其次为私人经营，也有少数是各个行业交易聚会的茶馆。

不管哪类茶馆，总是开堂最早，关门最晚的。

天未亮明，点燃三角亮油壶儿，茶馆的早堂就开始营业

了。铺门板刚打开，各自的几个老茶客就熟门熟路地踱着方步跨进来，走到每天坐惯了的位置坐下。这些人，大多是上了几分年纪，既没当到官又不会做生意的“绅粮”或自命“少年老成”的什么“少爷”。喝早茶已成了他们百无聊赖生活中不可少的环节，认为是一种惬意的享受。他们既是常客，又是贵客，对“品茗”颇具“权威”。只等他们一坐定，么师立即热情地拉长嗓门吆喝“茶来罗！”，连忙左手端着一摞铜茶碟、瓷茶碗，往茶客面前一放，提水壶的右手一抡、一甩，铜茶壶长咀里就吐出一条热气腾腾白亮亮的开水，手越提越高，水柱越拉越长，茶叶在白瓷碗里上下翻滚，眼看要溢出来了，但么师的手腕只那么向上一扬，水不吐了，刚齐碗口，然后熟练地斜扣上盖碗。么师这一连串动作，是那么迅速、干净、利落，桌面上“滴水不撒”，就连这些最会挑剔，最爱开“训纲”的老茶客，也不能不赞叹他们的沏茶技巧。这样的么师，县城很多茶馆都有，最著名的有龙福儿、张五林、曾桃儿、张国炳、王家兴、朱洪贵、李海清、何满娃、汪长生、文金元和冉胖子等。隔一会儿，茶客们才揭开盖碗，往碗里向外那么轻轻荡上几荡，霎时茶叶清香就伴着白蒙蒙的热气，溢散弥漫了。茶客们端着铜碟，往唇边呷上几口，再“舒咳”几声，话匣子就打开了。茶客愈来愈多，茶馆里顿时热闹起来。沿街人家的房顶都在冒烟，该是吃早饭的时候了，茶客才陆陆续续散去。有的，临走时还要给么师打一声招呼：“把茶留下。”因为这号人无事可做，又舍不得再花一碗茶钱，上午还要来“吃挣(tèng)命茶”。据曾开过茶馆的人说，早堂的生意关系着茶馆的声誉，一般是要特别殷勤，还不打算赚钱的。

大白天，再来看看街上这些茶馆，它的布置也是很有特色的。除少数几家外，一般都只一间店堂，从外到内分两排摆设十几张茶桌。临街的两张方桌多是紧抵门槛安放，条凳在门槛外的街檐下；也有两条桌腿在门外，两条桌腿在门内，跨着门槛搭的。这对茶馆老板来说，可以多搭茶桌；对某些茶客来说，便于看街，好随手拈来话题，信口乱扯，才消磨得完时光。茶馆门上一般有横匾写明招牌，如“崇仁”、“群进”、“六也居”等等。壁头上，多贴有“群贤毕至，可以清心”，“高朋满座，休谈国事”，“各照衣物，小心火烛”之类的条幅，也贴有卖“万金油”、“八卦丹”和“×××专治五淋、白浊、梅毒”等外来的商业招帖。一九四七年，在这条幅、招帖之间，还出现了“请选×××为国大代表”、“选×××为国大代表最能代表民意”招揽选票的标语。真是五颜六色，花狸狐骚。坐茶馆的可不大注意这些，他们自有各人感兴趣的话题和事做。

上午，坐茶馆的一般是“各奔其所”，“各归其位”的。

正西街的“群进”茶社是仁字袍哥的公口茶馆，在田粮管理处斜对门，离县衙门、县参议会也很近，是营山县党、政、参、袍等头面人物聚会之所。县参议会议长、付议长，县党部书记长，总舵把子等，几乎是每天上午十点左右都要来各据一桌的“上霸位”，坐上个把时辰，人们称之为“亮台”。田粮管理处、税捐处的处长，县中学校长，县银行经理，还有县政府的秘书、科长，以及“十人团”的其他要员，也是这里的常客，人们谓之“应卯”。各乡场的参议员，乡长只要进了城，也必然要到“群进茶社”来“忝陪侧座”，这既能

表示对头目的尊敬，也可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拉热关系，于公于私都有好处，常常是十几张桌子座无虚席。这些人衣冠楚楚，正襟危坐，茶馆里不吵不闹，安静肃穆，似乎特别“文明”、“正统”。一班趋炎附势之徒，路过这里，总要点头哈腰，连声招呼；普通老百姓经过门前，总是埋头急行，好象走在城隍庙门口一样，惶惶不安。

与“群进”茶社气氛大不相同的有另一类商人聚会的茶馆。中金华街的商会“公益”茶社，每天上午总要热闹拥挤好一阵子。匹头、百货、盐业、山货、油糖等各业商人和外地客商，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桌桌都有人在喊“茶钱，茶钱！”么师穿梭收钱沏茶，连声不迭地呼叫“谢茶、谢茶！”代客道谢。来这儿的人，泡碗茶只是个摆饰，忙着的是探行情，谈交易，袖筒子里捏指姆。特别是“关期”^①时刻，那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喜怒哀乐，变化无常。在那物价风涨，银根紧缺的岁月，怎不令这些生意人费尽心机，焦头烂额？东林寺内的“清诗”茶社每逢赶场正殿和坝子里都摆满了茶桌。荪房老板，谷米贩子，经纪掮客和卖谷子的小地主，大绅粮，卖公粮的庶务人员摩肩接踵，从上午九点左右足足要挤到下午一二点钟。茶客换了一批又一批，一张桌子摆上十多个茶碗也是常事，一场可卖几百碗茶。花市坝的“谦益”茶社地处花店外边。冷场天，有到花店称花的“燕儿贩子”（趸买零卖后扎账的小棉花商人）还有来自南部、仪陇等县住宿花店的外地棉花客商和本城棉花商来此吃茶兼谈生意；赶场天，茶馆里那就更加热闹拥挤。东林寺巷子口谢麻婆（也称彭麻婆）开的“大众”茶社规模不大，生意兴隆。每逢赶场就挤满了各大商家收购土布的经理、学

徒、经纪人、土布贩子和机房老板与卖布农民，成交额多时达千匹以上。这类茶馆应商业而兴，因商业而荣，对繁荣营山经济，促进物资交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还有一类，如十字口、东门口、西门口的几家私人茶馆，又是另一种风味了。十字口的任客贤、马宗海、黄德湘茶馆，茶房较窄，茶具也不精致，但处交通要冲，老板谦和，么师热情，一天到晚生意都好。木匠、石匠、泥水匠、其他各种手艺人 and 下力人常聚集在这些茶馆里，泡上一碗茶或者来一碗“玻璃”（白开水）或者喝几口“加班茶”②，啃火烧馍，等候主顾，联系活路。这类茶馆正是这些靠手艺或气力吃饭、无立锥之地的人落脚的好地方。乡下农民赶场累了，也常喜爱在这些茶馆喝茶、歇气、摆龙门阵。

茶馆中，袍哥的公口茶社最多。“崇仁”茶社（在何园茶社原址）是仁字袍哥的总公口，“六也居”茶社是义字袍哥的总公口，“尚义堂”茶社是青帮的帮会所在。这三个茶社集中在正东街，各有仁、义袍哥总社和青帮派的管事负责，内联各个公口，外接来拜码头的外地兄弟。各个势力大的袍哥大爷为巩固、发展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还有各自的坐堂公口茶馆。金华街的“西宁”茶社是仁字冉大爷的坐堂公口，“清涟”茶社归义字王大爷执掌，盐市街的“拱辰”茶社是仁字李大爷坐堂，东门口的“香泉居”茶社是义字郑大爷的堂口，纸市桥边的“辅仁”茶社坐堂的为李大爷，正西街的“西都”茶社张大爷坐堂，还有义字总舵爷撑腰，“广益”茶社是仁字蔡大爷的坐堂公口，外西街的“玉泉”茶社由仁字龚大爷坐堂，礼字何五爷在西街开的“中行”茶社，通过“中行社”的关系，得到仁、义两堂的共同支持。这，还

没有列完，但大街小巷已无处不有袍哥的公口茶馆，所有公口茶馆都有大爷派的管事，么大专门经管照料。这类公口茶馆外堂卖茶，来客极为复杂，官、绅、商、学、袍哥弟兄、鸦片贩子，跑摊匠、刀儿客、地痞流氓、无所不有。有的内堂开赌场，聚赌抽头；也有摆设‘红灯’的。赌博有麻将、纸牌、扑克、骰子、牌九、红宝、单双等，卖毒有鸦片、吗啡。

这些赌窟、烟榻，当官的睁眼不看，警察兵不敢吭声，害得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县城里的甘百禄、蔡国喜等人就是栽进这个旋涡爬不起来的代表。还有国民兵团分队长李英才输烂了，拿出手枪勾结土匪抢劫杀人，遭到了枪毙。这些公口茶馆也常是“吃茶讲理”的场所。旧社会，民间争边界、争产权、债务纠纷、婚姻扯皮、辱骂斗殴，相持不下时，双方往往到茶馆吃茶讲理，请大爷评理论断。有的大爷为赢得群众拥戴，也曾秉公论断或劝双方和解。但更多的论断，往往是亲者有理，疏者无理；兄弟伙有理，“白朋”（没海袍哥的）无理；送了人情的有理，送不起礼的无理。不少贫穷善良人在大爷淫威下，给茶钱、赔小心、挂红放火炮，磕转转头，结果落得有理而来，“无理”而归，含恨难言。这些公口茶馆是袍哥大爷的聚宝盆，邪恶势力的汇集点，也是营山县城的痼疽，罪恶的渊藪。

每逢寒暑假，东街的“何园”茶社（后来在这里另开了“崇仁”茶社又是另一番景象。）假期里，在成都、重庆或其他城市读书的一些学生回来了，大家常借茶馆作为聚会之所。“何园”位置适中，茶座宽敞，有外堂也有内堂，就成了回乡学生常来的地方。学生们回来了，在营山中学或小学的老同学、老朋友正值假期也常来聚会，这些回乡、在乡青

年人在一起品茗闲谈，畅叙友情，互相介绍各地风土民情，纵谈天下大事，评论时政弊端，谈笑风生，兴味盎然，给茶馆也似乎增添了一些生气。

城附中心小学的教师集资在下金华街流二桥附近开了一个茶馆，取名为“延雅”，便于课余时间在此吃茶打牌，作为自己的世外桃源，倒也别具一格。

还值得一提是北门桥的临时茶座和城南的“竹林”茶园这两个季节性茶社。

每到夏季，北门桥楼上河风习习，来乘凉的人很多。花市坝的“谦益”茶社往往趁机临时垒灶烧水，将桌凳摆在桥楼上和桥北码头及黄桷树下沙坝里卖茶。不少居民和小商贩，手艺人都在这里吃茶，有的还打牌，垂钓。既吃了茶，又乘了凉，如再钓得几尾鲜鱼，更是额外收获。这个茶座是逗人喜欢，受人称赞的。

南门外的“竹林茶园”是人称“陈二老爷”的陈级三开的。他利用私宅空地辟为茶园，雇工经营。出南门沿城墙东行六七十步，折向南下到小河边再行二三十步，过小木桥，入竹篱门，便是茶园。茶园临小溪，对岸就是翠屏山，无数翠竹遮天蔽日，林中茅亭高耸宽敞，傍依荷塘，桑园。亭中及竹荫下设有茶桌数十张，特备有躺椅、凉榻，桌旁椅畔摆设盆花。满目青翠，凉爽幽静，似乎酷暑也消退了大半。“竹林茶园”每年夏初开业，“十人团”“诸公”以及县城的官员和豪绅富商们的“转转会”就迁到了这里，轮番相邀，携带太太、公子、小姐到这儿乘凉、打牌、宴客。随着这些人的汇聚，卖纸烟瓜子的、装水烟的、卖水果的、打扇的都闻风而至，如影随行，再加上各家带来的老妈子、保姆、小丫头……，

也颇为喧闹拥挤。这里打麻将的场面，更是不同凡响。当时有几句顺口溜形象而深刻地描绘了那个情景：“里四人，外四人，四个角角站四人，老爷太太搓麻将，打扇·娃儿热汗淋，丫头妈子手脚酸，点烟递茶送毛巾。”普通人看到这种派头，那付架势，有几个还坐得住，有几个愿再来？好端端的避暑茶园无形中成了权贵们游乐的禁地。茶园老板抽头，侍宴获得大利；老百姓一提起“竹林茶园”却总是摇头瘪嘴。

茶馆生意，晚堂更比白天热闹，兴隆。

到了晚上，很多生意人，手艺人歇业吃茶来了，老年人品茗散心来了，居民们会友闲谈来了，几乎家家茶馆桌桌都坐得满满的，晚上卖的茶比白天还多。特别是到了热天，十字口、东门口、衙门口、纸市桥等店外地面比较宽广的茶馆，多把桌子摆到街上，搭好矮凳、凉椅，茶客们吃茶乘凉，坐满街心。再加那些卤菜摊子、花生簸簸、凉粉担担、熙熙攘攘，闹声阵阵，一个茶馆及其周围就形成一个夜市。外堂热闹，有些茶馆的内堂更闹热，赌徒们“挤场合”来了，瘾哥们“朋(Pēn)盘子”来了，呼么喝六，吞云吐雾。个别茶馆的赌场，到了深夜还备有酒菜消夜，以便赌友们鏖战通宵。

营山县城没有固定的戏院，川剧爱好者却不少，他们有时晚上也聚集在茶馆里“打玩友”或称“打围鼓”。两张茶桌一拚，就成了临时乐台。打“场面”的、唱角色的、听唱戏的、五方杂坐，济济一堂。只要小鼓吧哒一响，就开始唱起。一折又一折，茶客添了一批又一批，莫得坐位的，买碗茶站到听也情愿。“玩友”也的确打得不错。早年，坐桶子的李涪泉、唱须生的魏秉衡、打锣拉弦子的秦瑞武、全金武、唱高腔的王海如、唱青^老的黄锦春等等都是人们

叫好的“玩友”。莫若斯先生是有名的“玩友”鼓司。他烂熟各种曲牌，提签子手法高超，把“场面”指挥得丝丝如扣，文武谐调；他还擅长青衣，嗓音甜润婉转，字正腔圆。他和方体全合唱的《红梅阁》、《踏伞》等戏，常常赢得听众的喝彩和掌声。他组织的“朗清音乐社”就经常“打玩友”，后来组成了个“戏班子”，就是营山川剧团的前身。有的茶馆还有“扯诗条子”的，引得一班斯文人围着谜灯摇头哦吟；也有“钉飞叉的”，想碰运气一锭子打中赢得几文。这种雅俗共赏的玩意儿，还很有点吸引力。有的茶馆还经常接待江湖艺人，在晚堂讲评书，打荷叶，唱清音。只要有这类演唱，茶馆总是座无虚席，打唱不收场，茶客不离席。这些活动不仅给茶馆招来了顾客，也丰富了群众的文娛生活。

茶馆虽小，却牵连着社会各阶级、阶层。通过这形形色色的茶馆，各式各样的人物，热热闹闹的场面，纷纷繁繁的活动，我们多少可以看出解放前营山县城的风貌。

高宗乾 龙 辉 提供资料

陈永康撰稿

① “关期”借贷和归还的期限。

② “加班茶”吃别人喝过了的茶。

营山工商界在“抗美援朝” 捐献运动中

一九五零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营山工商界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在县城惠民宫广场举行了一次

规模巨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县城的四十二个行业和各区工商会员代表共计一千六百人参加大会，会议由县工商科科长廖次达主持，工商界代表王春华、龙正中、李光焰分别在会上控诉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以及单独对日媾和、重新武装日本的滔天罪行，全场热烈拥护，一致高呼：“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全县工商界团结起来！搞好业务，增加生产，支援中朝战士！”“反对美帝侵略朝鲜！”的口号此起彼落，响彻云空。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宣言书和“爱国增产公约”会后整队游行，愤怒的口号声响彻营山县城上空。站在十字口做小生意的一位老头说：“这样多的商人游行，我活了几十岁还是第一次见到过”。

会后，工商联发动商民，掀起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开展“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和声势浩大的拥军优属活动。廖次达首先带头将家中的银质餐具全部捐献，计一百四十两；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方志熙捐出了大银一锭，计五十两；廖润民、李俊民委员各捐献金戒子一只；张炳坤捐献大洋三十元。接着各工商业户争先恐后地踊跃签名捐献黄金、白银、生洋和人民币，折价共计一亿四千五百二十多万元（旧人民币）。此外还得到大量的慰问信、慰问袋等各种慰问品。

单城区订立爱国公约二千一百五十一份，慰问信一千二百封，捐献人民币（旧人民币）七百三十八万八千六百元，金戒子二个，银元一百二十元，大银子三锭，银器一百四十多两。

龙 辉

周光烈惨遭土匪杀害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消水区长周光烈被土匪杀害的事件曾轰动一时。

周光烈，营山县悦中乡人，民国二十年（1931年）被保送到杨森在广安开办的干部大队受训，次年三月毕业回营山，县长王静委他任双河门户练第三营营长，负责上三乡治安防务工作，在清剿土匪、整顿社会秩序上小有名气。范天烈当县长兼营山保卫团处长的时候调周光烈任副处长。周满怀雄心大志，积极组训民练营和挨门丁，维持地方治安。这时远距县城的双河、老林、消水、天池、三元、二龙各地，土匪甚猖獗，抢家劫场、杀人越货，频频报案。县长范天烈无法对付，遂运筹以消水设区为治，委派熟悉情况，较有整治办法的周光烈出任区长。周到任后，在各地暗设侦察，亲自带兵围堵、抓捕和枪毙了一批土匪，百姓商贾，皆以为德。周由此与匪群结下了宿怨。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时值三元场张三才嫁女，远近亲友，皆往祝贺，亲朋满座，热闹非常。正在“坐歌堂”的时候，渠县惯匪王国华的至亲李德银，随带十多岁的小伙子闯入张宅，向张送礼道喜后，提出要借用生洋两佰元。张三才认为来意不善、居心叵测，便虚与周旋热情地以“贵客”身份安置在魏东初栈房内休息，随即密报区署，并组织人枪将二人捉住，解送区署法办。大匪首

王国华得悉，多方托人说情，要求放人，周光烈不予理睬，果断地将二人立即枪毙于告化岩河边，尸体沉入河底。消息传到渠县，匪群哗然。王国华十分震怒，立誓要报此仇。

过了一月，时值民国二十五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这天正是消水逢场，在陆续上街赶场的人中间，出现了一些陌生人，行动异常，被区员曹复周察觉、来不及报告周光烈，就组织几个队丁搜查。匪众露出马脚，未敢迟疑，便抢先开枪，子弹打在队丁翟昌元的指姆上，曹转身抄小道便跑。早已埋藏在四周的土匪，闻听场内枪响立即蜂涌入场，重重围困区公所，霎时枪声四起，区署炊事员曹立万当场被打死，老百姓吓得纷纷逃散，土匪大声吼叫：“我们是来‘叫梁子’的，不是来要东西的，大家不要害怕”。周光烈猝不及防，随带警丁曹时璋、王先义意图硬拼突围，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便爬上屋顶隐蔽在天花板内，居高临下，与匪互击，土匪死伤四、五人，双方坚持不下。匪众便将周光烈的家属张世秀（营山县城张星斋的女儿）押到天花板下面强迫呼叫周光烈下来投降，否则将她杀死。张世秀身怀有孕，快要分娩，放声大哭，悲痛欲绝。匪徒还抓来一些无辜百姓，用鞭子抽打，想逼周下来。最后匪徒又拿来木柴稻草点燃，顿时区署厢房、门口火光熊熊。这时周光烈身已负伤，眼看火将烧身，只得翻上屋顶沿房脊跑了一条街。到中街曹敬熙的房屋处（今消水营业所门前）才从竹竿上梭下来。刚一落地便被土匪捉住，捆在柳树上，先用鞭子抽打，然后用枪击毙。待双河的队丁赶到时，土匪已扬长而去。县长范天烈下令缉凶，但凶手已杳无踪影。区署随即迁双河场。

刘致中

王济民

惯 匪 陈 彬 如

陈彬如，小名三元，原籍无可考，前清光绪年间流落在营山西桥、观音（星火）、茶盘及渠县宋家、蓬安福德一带，名为讨口，实为恶耍。每逢各地场期，他进场时就去糊一脑壳田泥，一手端着水碗，不言不语，虎起一块脸，不管是铺户摊贩，卖饮食的或卖日用品的，挨家挨户，站在人家面前，一手就去碗里沾水，直向自己脑门上拍。还把那条泥尾巴（辫子）拿在手上舞，弄得泥浆乱溅。讨到钱也不道声谢，转身又去二家。这些商家摊户见他来了，如逢煞星，老远就把钱递了过去，只求他快走，免把货物弄脏。

民国初那十多年，四处兵害连年，匪风四起。陈彬如当时已二十好几了，早已不满足沿街叫化的生活，常串通一些无业游民，搞起了拦路抢劫的勾当，几次得手后居然拖起了“棚子”，自封为头领，人称“大哥”，往来活动于营、广、渠、蓬几县的边缘场镇，抢劫行凶，无恶不作。那时四川各地的驻军、乡绅、土匪无不以袍哥组织为媒介，相互拉拢勾结，大讲哥们义气，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和声威，掠取社会地位。陈彬如既然有一批得力的兄弟伙，又握有些枪杆子，不久就投靠了广安巨匪胡占鳌，胡自命为团长，（民国七年受颜德基招安为靖国军第一纵队司令，）陈就当了胡部的营长，越发不可一世了。当时这些场镇的袍哥、土匪对他都争相巴结合